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 THE WESTERN WORLD 2003



華夏文明與西方世界

主編 林中澤

博士苑出版社

華夏文明與西方世界

林中澤 主編



博士苑出版社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書 名： 華夏文明與西方世界
主 編： 林中澤
出 版： 博士苑出版社
社 址： 香港新界葵涌華星街 8-10 號
華達工業中心 A 座 18 樓 4 室
電 話： (852)28336386
電 傳： (852)28345653
電 郵： mastermindph@tdctrade.com
印 刷： 怡祥彩印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二〇〇三年五月
定 價： HK\$68.00
國際書號： ISBN 962-86287-6-3

弁 言

中山大學歷史系有中外關係史研究的悠久傳統，已故教授陳寅恪、岑仲勉、戴裔煊、朱傑勤、周連寬等先生，都曾為該領域的研究做出了舉世矚目的貢獻。蔡鴻生教授繼承了這一傳統，不僅自身學業有成，更培養了一支梯隊從事該領域的研究，使中山大學歷史系這一學術薪火後繼有人，且向兄弟單位提供骨幹、撒播火種。

蔡鴻生先生的治學和為人，受到學界泰斗季羨林教授的高度評價，謂其“雖然學富五車，却從無驕矜之氣”。今年適逢蔡先生七十華誕，我們作為弟子，本擬照國際學界慣例，編撰文集，以表慶賀。但蔡先生認為，出版有水平的學術論文集，是一種文化積累，於學科建設有益；如標榜紀念其個人誕辰，則屬無謂。為了不拂師意，本論文集的題名、裝幀設計等，仍以一般學術論文集面貌面世。

蔡先生長期從事中外關係史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他的治學風格和獨到見解，見諸其已發表的著述，尤其是《俄羅斯館紀事》（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1998年12月）、《學境》（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1年1月）、《尼姑譚》（中山大學出版社，1996年9月）、《清初嶺南佛門事略》（廣東高教出版社，1997年7月）等。我們這裏所要特別介紹的是，蔡先生對中外關係史這一學科的內容架構及其研究方法所提出的若干具體見解。

蔡先生以“兩道二西”四字概括了中外關係史的主要內容、基本架構。所謂“兩道”，指的是歷史上中國對外聯繫的主要通道，即西域道和南海道。前者被西方學者譽為絲綢之路；而後者則被附會為海上絲綢之路，儘管古代海路的交通從未以絲綢作為主要物質內容。至於“二西”，則指歷史上的西域和西洋。“兩道二西”是個整體的概念，在中外關係史的研究中，必須具有史家的通識，不能祇注重陸路的交通，而忽略海上的交通；祇重視西域而忽視西洋。惟有把握住這整個內容架構，對中外關係史纔能有一個全面的認識。他多次強調，歷史從哪裏開始，思路就應從那裏開始。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無非是為了求真，還中外關係史以本來面目；出於功利動機，肆意炒作歷史，絕非學者本色。

關於中外關係史的研究方法，蔡先生提出“互動互證”和“見物見人”兩項原則。

“互動”，指的是要注意雙邊關係的互相作用、互相牽動、互相影響。在古代中外關係中，無論是文化、經濟、軍事、政治等領域，其影響固然不是對等，但却是相互的，甚至是連鎖性的。因此，要用互動的眼光來看待古代的中外關係。就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蔡先生反對祇講漢化，不講胡化；或相反的，祇道胡化，而不言漢化。他認為即便對中土一方昭昭，若對關係的另一方昏昏，則對問題斷不可能有明晰客觀的看法。他特別注意陳寅恪先生關於文化間接傳播和直接傳播不同的論斷，一再強調在中外關係研究上，必須十分重視時空的觀念，重視研究對象隨着時間推移、空間更換所帶來的變異。

“互證”，即重視研究過程中各種資料的互相參證，切忌孤證，更不可浮躁臆斷，遽下結論。蔡先生常舉示陳垣先生的文章，作為嚴謹考證的範例以啟發弟子。他自己在研究中，不僅運用文獻與文物互證，文獻與傳奇互證、文獻與佛書互證，更注意中外資料的互證。就後者，以往國人囿於歷史條件，力不從心，殆難辦到；而今隨着我國與國際學術交流的日益廣泛深入，客觀的障礙越來越少，要做到這一點已並非不能，越來越取決於學者主觀上重視與否，努力與否了。

“見物見人”，指在中外關係研究中，既要重視物質文化的交流、精神文化的交流；更要着眼於從事這種交流的群體，包括商人、僧人、使節等。前者由於不乏文獻查考，且隨着考古的不斷發現，有越來越多的實物資料可供參考，學者較易以三維的方式，展示具體的形象。後者則不同，月換星移，創造中外關係史的各個群體的活動過程、活動模式以至他們的內心世界等等，往往隨着事件的過去而被遺忘。因此，我們耳熟能詳的是他們的創造成果，至於他們是如何得到這些成果的，却鮮為人知。中外關係史的重建，有賴於對國際交往中人群組合形態和活動方式的深入探討。

本論文集之所以名為《華夏文明與西方世界》，旨在體現上述思想。所謂“華夏文明”，指的是中華大地多元一體的文化構成；而“西方世界”，則包括前述的“兩道二西”。收入的文章，殆圍繞着古代中國如何通過陸海兩道，與西域、西洋發生接觸交流，並逐步形成和發展起華夏文明這一主題。

本論文集是群策群力的產物。其中論文水平，我們不敢妄自溢美；但可以說，作者們“認真”二字，蓋可當之無愧。願本文集的出版對中外關係史研究這座大廈，有些許添磚加瓦之功；更期有拋磚引玉之效，促進有關問題進一步討論。至若本書文字排版上或出差錯，文章內容或見“硬

傷”，吾儕身主其事，難辭其咎，仰祈批評指正。

本論文集的出版，得到中山大學歷史系領導、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領導班子的鼎力支持，得到泰國友人王僑生先生暨夫人陳瑞雲女士的熱心關切，謹此衷致謝忱！

林悟殊 林中澤 謹識
2003 年早春於中山大學永芳堂

目 錄

弁 言·····	林悟殊 林中澤	(1)
《陳寅恪集》的中外關係史學術遺產·····	蔡鴻生	(1)
西漢南海道管見·····	林遠輝	(7)
西突厥與拜占廷金幣的東來·····	林 英	(21)
唐代“酒家胡”的身份和技藝·····	曾玲玲	(39)
晉唐南海道佛僧與商人關係試析·····	何方耀	(49)
唐代九姓胡奉火祆教“詣波斯受法”考·····	張小貴	(63)
泉州摩尼教淵源考·····	林悟殊	(75)
馬氏汪古由景入儒的轉變歷程·····	殷小平	(95)
天主教獨身主義的報應觀、歷史觀及其與儒學之衝突 ——以利瑪竇的有關論述為例·····	林中澤	(111)
從儒學到天學 ——吳漁山人生信仰的鉅大轉折·····	章文欽	(123)
雍正年間廣州禁行天主教始末·····	胡桂玉	(147)
南海道與早期西畫東傳·····	江澄河	(155)
論阮元的自然科技活動及科技思想·····	顏廣文	(171)
早期華文報紙在中西溝通中的作用 ——以《循環日報》為例·····	劉聖宜 吳倫霓霞	(187)
唐宋市舶太監與南海貿易·····	王 川	(199)
15-17 世紀廣東人在越南活動考述·····	李慶新	(211)
自由、限制、管制 ——明清時期亞洲諸國的中國海商貿易政策·····	陳偉明	(231)
海運毛皮與清代社會·····	周 湘	(243)
廣州巴斯館考·····	郭德焱	(255)
中葡關於澳門水界之爭 ——從 1871 年馬留洲設關到 1887 年中葡立約·····	徐素琴	(269)

Contents

Foreword	Lin Wushu and Lin Zhongze (1)
The Academic Heritage for Studies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in <i>The Collected Works of Chen Yinke</i>	Cai Hongsheng (1)
Some Remarks on South Sea Route (<i>Nan Hai Dao</i>) in West Han Dynasty	Lin Yuanhui (7)
Western Turks and the Byzantine Gold Coins Unearthed in China	Lin Ying (21)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ccomplishment of Jiujia-hu in Tang Dynasty	Zeng Lingling (39)
An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Buddhism Monks and Merchants: From Jin Dynasty to Tang Dynasty in <i>Nan Hai Dao</i> (South Sea Route)	He Fangyao (49)
Yi Bosishoufa: Tang Sogdian Zoroastrians' Pilgrimages to Persia for Accepting Doctrines	Zhang Xiaogui (63)
On the Origin of Manichaeism in Quanzhou	Lin Wushu (75)
The Conversion from a Nestorian to a Confucian of the Ma Family of Ongut Tribe in Yuan Dynasty	Yin Xiaoping (95)
Catholic Celibate Conception of Retribution and Conception of History and Their Conflict with Confucianism: An Example from Matteo Ricci	Lin Zhongze (111)
From a Confucian to a Padre of the Jesus Society: The Great Turn of the Life Religious Belief of Wu Yushan	Zhang Wenqin (123)
The Ban on Catholicism in Canton During Emperor Yongzheng's Period	Hu Guiyu (147)
Spreading of Western Paintings in South China Sea Trade Route(<i>Nan Hai Dao</i>)	Jiang Yinghe (155)
On Na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and Scientific Theory of Ruan Yuan	Yan Guangwen (171)

-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Newspaper's Achievements in Advancing
Cultural Exchange during the 1870s to 1880s: Taking *Xun Huan*
Ri Bao as an Example.....Liu Shengyi and Wu Luen Nixian (187)
-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unuch Superintendents of Maritime Trade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Trade: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618-1279)..... Wang Chuan (199)
- Cantonese in Vietnam from 15th Century to 17th Century..... Li Qingxin (211)
- Freedom Restriction and Quasi-restriction: Asian Countries' Trade Strategy
to Chinese Maritime Trader in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 Chen Weiming (231)
- The Maritime Fur Trade in the Qing DynastyZhou Xiang (243)
- Study on Parsee Factory in Canton during Qing PeriodGuo Deyan (255)
- China-Portuguese Controversy of Territorial Waters in the Periods
of Tongzhi and Guangxu Xu Suqin (269)

《陳寅恪集》的中外關係史學術遺產

蔡鴻生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摘要：本文探討了《陳寅恪集》的中外關係史學術遺產。從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角度，著重分析了陳寅恪先生通過思維範疇化所形成的五大理念，即傳播、格義、體用、世代和連環，並對這些理念在實際研究中的準確理解和運用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和心得。

關鍵詞：陳寅恪 中外關係史 傳播 格義 體用 世代 連環

新編《陳寅恪集》十四卷，是著者傳世的論文、專著、札記、講義、雜稿、書信和詩作的完整結集。作為一代宗師精勤筆耕的記錄，它的開拓性和典範性，及其歷史思維的深度和廣度，都是值得後人從多方面進行研討的。

在陳寅恪先生的學術遺產中，中外關係史並不是治學的重點，祇是他的學術眼界觸及的領域。早年著作《三國志曹沖華陀傳與印度故事》、《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以及《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跋》、《狐臭與胡臭》等，對“二西”（西域和西洋）與中國的文化因緣，均在不同程度上有發覆之功，早已蜚聲學界了。至於散見的有關塞表殊俗和胡漢關係的論斷，其卓識對後學也無異提示和導向，猶當貫串會通，以收金針度人之效。本文是個人的讀書心得，談不上什麼系統的闡釋和全面的整合。力所能及的祇是提出問題，即探尋陳寅恪先生通過思維範疇化所形成的若干理念，如傳播、格義、體用、世代和連環等，聊供研究中外關係史尤其是文化交流史者參考。

一 文化傳播的兩種方式

佛法東傳和西學東漸，是中國文化史上兩次著名的“西潮”。關於“二西”的傳播方式及其利弊，陳寅恪先生讀慧皎《高僧傳》作過如下的精闢論述：

自漢明乞梁武，四百五十年間，譯經諸大德，天竺人居四分之一，其餘皆屬賓、西域及涼州之人。據此可知六朝文化與中亞關係之深矣。

間接傳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地，因易環境之故，轉可發揮其特性而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歐洲，與希臘哲學接觸，而成歐洲中世紀之神學、哲學及文藝是也。其害則輾轉間接，致失原來精意，如我國自日本、美國販運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研究本原，首在通達其言語。中亞語言與天竺同源，雖方言小異，而大致可解，如近世意語之於拉丁。按《出三藏記集》卷八僧叡大品經序謂：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蓋古譯音中如彌勒、沙彌之類，皆中亞語。今日方知，足證當時實此類之經本。然其所譯，大抵仍皆是梵文，猶天主教人齋譯諸書，實皆拉丁之本，而音譯名字猶存法意土音也。因此可知中亞人能直接通習梵文，故能直接研究天竺學術之本源。此則間接之害亦不甚深也。至其利則中亞大小乘俱盛。¹

上面這段引文，充分表現出陳寅恪史學的國際眼界和辯證思維。中古時代的文化傳播，既是漸進的，又是曲折的。由於當時物質技術條件的限制，來自“文化本原”的直接傳播不可能起主導作用，“輾轉間接”纔是普遍存在的方式。因此，為了探索一種文化因緣在空間上的展開，也即如何從此地傳入彼地，必須找出中間環節，纔不致於架空立說。寅恪先生對文化傳播的中介性或間接性的重視，與現代西方哲學強調“綜觀”不謀而合：“發現或發明中間環節是極為重要的。”²

文化本原通過中間環節而變異，導致正宗與變種並存，蔚為文化交流的奇觀。西域的九姓胡（粟特），南海的三佛齊（蘇門答臘），是傳播波斯文明和大食文明的中介，由此而來的胡俗和蕃俗，從信仰、音樂、服飾、飲食直至喪葬，無不塗上間接傳播的異彩。時至今日，描述這類歷史現象已經不算什麼創見了；至於如何作出“有利亦有害”的判斷，可能就要以陳寅恪史學為範式，以便獲取更敏銳、更精微的“通識”。

二 “格義”的功能和限度

在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相逢之初，其認同的邏輯手段貌似融會，實為附會，即所謂“格義”是也。陳寅恪先生在《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中，明確指出“格義”現象的由來及其與比較研究的差異：

西晉之世，僧徒有竺法雅者，取內典與外書以相擬配，名曰“格義”（“格義”之義詳見拙著《支愍度學說考》），實為赤縣神州附會中西學說之初祖。即以今日中國文學系之中外文學比較一類之課程言，亦祇能就白樂天等在中國及日本之文學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國文學上之影響及演變等問題，互相比較研究，方符合比較研究之真諦。蓋此種比較研究方法，必須具有歷史演變及系統異同之觀念。否則古今中外，人天龍鬼，無一不可取以相與

比較。荷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鑿附會，怪誕百出，莫可追詰，更無所謂研究之可言矣。³

引文提及的《支態度學說考》，博大精深。其中詳細剖析“格義”的成因和流變，認定“其為我民族與他民族二種不同思想初次之混合物”，⁴並指出這個古老模式對宋代理學援釋入儒的影響，發前人所未發。研究中外關係的學人，倘能對寅恪先生所闡述的義理尤其是“歷史演變及系統異同之觀念”有所領悟，則對歷史上從海陸兩路入華的精神舶來品和物質舶來品，當可作出更具深度的觀察，避免簡單化，進而澄清“引進”和“接軌”之類的流行觀念。

三 “中體西用”的歷史驗證

陳寅恪先生對晚清“中體西用”的文化主張，曾在自己的歷史研究中進行過不止一次的驗證。其目的當然不是為了提出社會改革的方案，而是旨在給主體文化與客體文化的結合方式作出理性的說明。

驗證之一，見於《四聲三問》：

官商角徵羽五聲者，中國傳統之理論也。關於聲之本體，即同光朝士所謂“中學為體”是也。平上去入四聲者，西域輸入之技術也。關於聲之實用，即同光朝士所謂“西學為用”是也。蓋中國自古論聲，皆以官商角徵羽為言，此學人論聲理所不能外者也。至平上去入四聲之分別，乃摹擬西域轉經之方法，以供中國行文之用。其“顛倒相配，參差變動”，為“天子聖哲”之例者，純屬於技術之方面，故可得而譜。即按譜而別聲，選字而作文之謂也。⁵

驗證之二，見於《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禮儀”章：

綜合隋代三大技術家宇文愷、閻毗、何稠之家此世蹟推論，蓋其人俱含有西域胡族血統，而又久為華夏文化所染習，故其事業皆藉西域家世之奇技，以飾中國經典之古制。如明堂、輅輦、袞冕等，雖皆為華夏之古制，然能依託經典舊文，而實施精作之，則不藉西域之工藝亦不為功。夫大興、長安城官市之規模取法太和洛陽及東魏高齊鄴都南城，猶明堂、車服之制度取法中國之經典也。但其實行營建製造而使成宏麗精巧，則有資於西域藝術之流傳者矣，故謂大興長安城之規模及隋唐大輅、袞冕之制度出於胡制者固非，然謂其絕無繫於西域之工藝者，亦不具通識之言者也。前賢有中學作體，西學為用之說，若取以喻此，其最適合之義歟？⁶

在歷史驗證的基礎上，陳寅恪先生對中國文化如何實現創造性轉化的問題，作出如下一段“通古今之變”的預言：

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學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⁷

這段落地有聲的金玉之言，在《陳寅恪集》的中外關係史學術遺產中，堪稱“重中之重”，任何時候都是發人深省的。

四 胡人漢化的世代層次

魏晉以降，直至隋唐，胡人漢化的問題，在文化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其中涉及“興生胡”與“土生胡”的差異，似乎不難辨認；至於土生胡中華化程度的深淺，如果沒有精確的分析，就比較容易產生混亂。例如，據墓誌或文書中的胡姓（源出西胡或東胡之姓），就斷言某甲某乙屬胡人族類，甚至認定某時某地仍有胡人聚落，都是很難取信於人的。

陳寅恪先生認為觀察胡人漢化必須注重世代層次，僅僅按“姓”論人，就容易陷入簡單化的誤區。他在考釋白樂天和元微之的世系時鄭重指出：

吾國中古之時，西域胡人來居中土，其世代甚近者，殊有考論之價值。若世代甚遠久，已同化至無何纖微跡象可尋者，則止就其僅餘之標幟即胡姓一事，詳悉考辨，恐未必有何發現，而依吾國中古史“種族之分，多繫於其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統”之事例言之，（見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則此類問題亦可不辨。故謂元微之出於鮮卑，白樂天出於西域，固非妄說，却為贅論也。⁸

除此之外，陳寅恪先生為給“談唐代異族華化史者又增一新例”而做的個案研究，即《劉復愚遺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問題》一文，往往被人忽略，特將其結論引在下面，藉以提醒胡人胡事的當代論者切勿掉以輕心：

藤田（豐八）氏以劉為伊斯蘭教徒習用名字之音譯，固不可信，而桑原（鷲藏）氏以廣州通商回教徒之劉姓實南漢之賜姓，今若以復愚之例觀之，其說亦非是。鄙見劉與李俱漢唐兩朝之國姓，外國人之改革姓者，往往喜採用之，復愚及其他伊斯蘭教徒之多以劉為姓者，殆以此故歟？關於復愚氏族疑非出自華夏一問題，尚可從其文章體製及論說主張諸方面推測，但以此類事證多不甚適切，故悉不置論，僅就其以劉為氏，而家世無九品之官，四海無強大之親，父子俱以儒學進仕至中書舍人禮部尚書，而不祭祀先祖，及籍貫

紛歧，而俱賈胡僑寄之地三端，推證之如此。⁹

很明顯，胡姓作為標幟性的符號，如果脫離禮俗體系，就會失掉認知價值。在胡漢世系問題上，忽略世代感，也就沒有歷史感可言了。

五 “連環性”——歷史聯繫的網絡式理解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道出一個平凡的真理：“能在聯繫中看事物的就是一個辯證法者，不然就不是一個辯證法者。”¹⁰ 陳寅恪史學的辨證思維，正在於能在聯繫中看事物，“連環性”的概念就是它的集中表現。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的下篇，取名“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可說是陳寅恪先生“以現代國際觀念來看唐史”¹¹ 的典範性的學術演示。內云：

所謂外族盛衰之連環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獨與唐室統治之中國接觸，同時亦與其他之外族有關，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強大可致某甲外族之滅亡或衰弱，其間相互之因果雖不易詳確分析，而唐室統治之中國遂受其興亡強弱之影響，及利用其機緣，或坐承其弊害，故觀察唐代中國與某甲外族之關係，其範圍不可限於某甲外族，必通覽諸外族相互之關係，然後三百年間中國與四夷更疊盛衰之故始得明瞭，當時唐室對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蓋中國與其所接觸諸外族之盛衰興廢，常為多數外族間之連環性，而非中國與某甲外族之單獨性也。

這種對歷史聯繫的網絡式理解，把雙邊與多邊結合起來，構成一個互動的視野，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我深受其惠，念念不忘，曾形諸筆墨：

九姓胡之所以在八世紀上半期頻頻入貢，還有更深刻的動因，這就是阿拉伯人對中亞兩河流域的步步進逼。我從這場席捲粟特城邦的“聖戰”浪潮，追溯到它對唐代胡漢關係的影響，進一步領會到陳寅恪先生關於“外族盛衰之連環性”的判斷，是一個嘉惠後學的卓識。¹²

《陳寅恪集》的中外關係史學術遺產，並不限於本文列舉諸端。不過，即使僅據上述五項立論，也足以說明這些滲透通識的概念工具，對深化歷史思維有什麼樣的價值。中外關係史是專門史，一“專”就容易忽略“通”。在當代治學日益專門化的趨向之下，歷史觀念中“通識”的式微，是值得我輩學人警惕的。

註 釋：

- ¹ 陳寅恪：《讀史札記三集》，三聯書店，2001年，第307-308頁。
- ² 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5頁。
- ³ 陳寅恪：《書信集》，三聯書店，2001年，第161頁。
- ⁴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三聯書店，2001年，第123頁。
- ⁵ 同註4，第381頁。
- ⁶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三聯書店，2001年，第88頁。
- ⁷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年，第284-285頁。
- ⁸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三聯書店，2001年，第317頁。
- ⁹ 同註4，第365-366頁。
- ¹⁰ 柏拉圖：《理想國》，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05頁。
- ¹¹ 陳寅恪：《講義及雜稿》，三聯書店，2002年，第495頁。
- ¹² 拙著：《我和唐代蕃胡研究》，《學林春秋》三編，上冊，朝華出版社，1999年，第246-247頁。

The Academic Heritage for Studies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hen Yinke*

Cai Hongsheng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cademic heritage for studies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hen Yinke*. It makes analysis of the five concepts that Prof. Chen Yinke summarized through his own academic researches. They are diffusion (*chuanbo*), forced analogy (*geyi*), foreign culture's specific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tiyong*), historical transition through times (*shidai*), interactive connection of China and outside world (*lianhuan*). The author then gives his own remarks on how to understand accurately and make good use of these concepts.

Key Words: Chen Yink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diffusion (*chuanbo*); forced analogy (*geyi*); foreign culture's specific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tiyong*); historical transition through times (*shidai*); interactive connection of China and outside world (*lianhuan*).

西漢南海道管見

林遠輝

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

摘 要：本文僅就漢譯使往黃支乘坐船隻、計程起點、是否橫越馬來半島、是否漢武帝所派遣和黃支是否自漢武帝以來皆獻見等問題進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看法。

關鍵詞：西漢 南海道 漢武帝 黃支

南海道，一般也稱海上絲綢之路，或海上絲綢之路的南海航綫。我國古籍中最早記載南海道的，要稱班固的《漢書》，它記述了西漢時期的南海道：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賸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¹

由於這段記載過於簡略，古籍原又無標點斷句，標點斷句的不同，會有不同的理解，加之“《漢書》是自始就認為難讀的”，²而漢譯使船隻所經各個古國的名稱，除黃支外，又都僅此一見，使《漢書》的這段記載存在着很多的疑問，引來很多的中外學者對它不斷進行研究、探索，並取得了不少的可喜成果。筆者不揣愚陋，也斗膽就某些問題，談一談個人的看法，以求得學者的指教。

問題之一：漢譯使計程的起點從哪裏？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這一記載使人產生疑問：

首先，作為“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的“都會”番禺（今廣州），³明明是漢譯使的啟航地，而徐聞地處雷州半島南端，既無內河可行船，陸路行走也甚是困難，在漢代，它之所以能成為一個重要的港口，是因為離開番禺（今廣州）走南海道的船隻經瓊州海峽時，它是必經之地，船隻要在此停靠，補充淡水、糧食等。隋唐以後，從廣州往東南亞和南亞各國的船隻，大部分從海南島東部海面經七洲洋直下南中國海，徐聞、合浦港也就開始冷落了，湮沒了。《漢書》為何不說從番禺到都元國需要多少時間，却要說“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呢？其次，在日南障塞、徐聞、合浦三地之間，船隻經過的順序應是徐聞、合浦、日南障塞，按照一般的說法，應是“自徐聞、合浦、日南障塞”，《漢書》為何却要說“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呢？難道船隻是從日南障塞啟航，再到徐聞、合浦，然後纔到都元嗎？誰都明白，這是有違常識的。第三，是因為標點的問題，不應是“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而應像有的學者所標示的那樣，作“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嗎？可是，這樣一改，徐聞和合浦就變成了日南的障塞。我們知道，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的日南和徐聞、合浦是屬於兩個不同的郡的。徐聞是合浦郡的一個縣，合浦則是合浦郡的郡治所在地，日南郡和合浦郡之間陸地間隔着九真、交趾、蒼梧等郡，徐聞和合浦都不是日南郡的障塞。因此原來的標點是對的，改成“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則是不對的。⁴第四，“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這“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究竟是從日南障塞還是從徐聞、合浦算起呢？我們知道，日南障塞、徐聞、合浦三地，尤其是日南障塞和徐聞之間，是有相當的距離的。從雷州半島的徐聞到日南障塞，在漢代，按當時船隻的行駛速度是需要相當的時日的。從徐聞還是從日南障塞作計程起點，“船行可五月”後所到的都元國，其所在的位置將會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也影響到其後至黃支國、已程不國所經各個古國所在的位置。

那麼，“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究竟應作如何理解呢？管見以為，它除了說明由於受當時造船技術和航海知識、航海技術條件等的限制，漢譯使所乘到黃支、已程不國的船隻，走的是經過瓊州海峽、日南障塞的航線，這與到隋唐以後船隻是從廣州直接經海南島東南海面至東南亞以至印度洋各國的航線不同外，其計程起點應是日南障塞。

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漢譯使歸程的計程終點得到證明：“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⁵我們知道，日南郡是漢武帝平定南越後於元鼎六年（前111年）設立的粵地九郡之一，共轄“縣五：朱吾，比景，盧容，西捲，象林。”⁶而象林則為日南郡最南一縣，其故地在今越南中部廣南一峴港省，其南境有認為抵今華列拉角（Cap Varella）和大嶺（Dai Lanh）一帶。因此，“日南障塞”，最南的障塞當在象林縣南境，在今廣南一峴港省附近，或華列拉角和大嶺一帶，也即“日南象林界”。這樣，計程的起點是日南郡的象林的南境，計程的終點也是日南郡象林的南境。《漢書》的記載在這一問題上是始終一致的。

因此，管見以為，漢譯使航程的計程起點是日南障塞，具體地說，是從日南郡最南的象林縣的南部障塞，也即“日南象林界”算起。